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爲討論政治社會化與性別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差異之間的關係，研究過程分爲兩個階段，首先以 t 檢定檢測兩性於政治社會化過程、政治定向和政治行爲上的異同；接著，以複迴歸模型控制個體的大學階段政治社會化經驗，觀察性別是否仍爲大學生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的重要預測變項，並比較影響兩性政治態度和行爲之因素的不同。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關於本文的研究發現，將分成兩部份敍述之，包括初步發現和複迴歸模型的分析。

一、初步發現

在第三章中我們分析兩性於家庭、學校和大眾傳播媒介等政治社會化機制中差異，以及其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的異同，而研究結果顯示：

1、性別與環境因素的關係

首先，在家庭因素方面，女大學生的家庭政治化程度顯著高於男大學生，細究其內部概念，發現差異來自於女大學生認知雙親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較高，且父母親較常與自己討論有關公共事務的問題，此點研究發現打破了社會大眾的既定印象－認爲父母親會較常與兒子討論政治。

其次，在學校因素方面，男、女大學生在政治學相關的修課中並沒有差異存在，與預先的假設不符，本研究認爲原因在於題目設計時未考慮到學生修課的動

機，而從結果分析，修習學分數的多寡與各科系的修業特色有密切的關係。另外，兩性在內、外在學校功效意識上也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顯示大學生對於自身瞭解學校管理的能力和對於學校會不會關心學生的感受方面，有差不多的認知。但在課餘活動的參與方面，男大學生顯著地比女大學生活躍且積極於參與學校的公共事務。

在大眾傳播媒介方面，我們測量了兩性的政治媒介曝露量、注意程度和政治媒介的參與度等三部份，而研究結果皆符合研究假設，即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更常接觸和注意政治媒介，也較積極於參與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若細究政治媒介的不同種類，則在政治媒介的曝露量和注意程度方面，兩性除了在電視的曝露量、電視的注意程度和政論性談話節目的注意程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外，在報紙、政論性雜誌和網路新聞上，男大學生的接觸都較爲頻繁、注意程度也較高，且電視是大學生全體最常接觸政治資訊的媒體管道，顯示電視涉入現代人生活之深；其次，在參與度方面，男大學生較女大學生常投書給報紙、叩應（call in）政論性節目以及在網路上表達自身對政治議題的看法，且研究結果顯示網路是大學生最常參與的政治媒介活動。整體而言，兩性在電視的相關測量中大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顯示女大學生似乎對於電視的新聞節目（不論是新聞報導、政論性談話節目或舉辦的電話投票）較爲感興趣，對於書面的、文字型式的新聞則反之。

2、男、女大學生與人格特質的關係

在人格特質方面，本文納入了權威性人格和個人現代性作爲分析，兩項研究結果皆與預期相符合。在權威性人格的測量方面，男大學生顯著高於女大學生，顯示男大學生較尊崇傳統的價值觀念，但相對地，也較爲強勢、沒有包容心。

其次，在個人現代性的測量方面，女大學生顯著高於男大學生，顯示女性急

於掙脫男性霸權文化所建立的傳統社會價值觀，而欲建立符合現代化社會中個人所最常具有的態度、價值取向、認知和思考的模式，這些特質將有利於女性擺脫過去服從的地位，而建立自我的認同。

最後，若將這兩項人格特質與 1975 年和 1991 年兩波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資料相比較，可以發現：大學生的權威性人格有明顯下降的趨勢，而個人現代性則逐年緩慢地上昇，兩者呈現負相關（r=-0.3），其相互對立的關係，正逐漸推動了社會現代化的發展。

3、男、女大學生與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的關係

本文的政治定向包含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感和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政治行爲則以政治參與作爲測量。首先，在政治知識方面，男大學生顯著高於女大學生，顯示男大學生對政治的涉獵較豐富，且深入探討後發現，其差異在於男大學生對國內外政治人物的職稱較爲熟悉。

其次在政治信任感方面，兩性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但細分其概念後發現，女大學生在「可信度」的次指標上，顯著低於男大學生，顯示她們較男大學生認爲政府官員會浪費老百姓所繳納的稅金，以及所做的事大多數是不正確的。除了兩性間的比較，我們亦觀察大學生與一般民眾間的差異（請參閱表 3-11、表 3-13），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較一般民眾低。

另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方面，不論是內在或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其研究結果皆符合預期的假設，即女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低於男大學生，但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較高，顯示女大學生認爲自身瞭解政治事物和政治過程的能力較低，但卻較爲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的需求會有所回應與重視。除了性別的比較，我們亦比較了大學生和一般民眾之間的異同，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較一般民眾高，但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則較低。

最後，在政治參與方面，兩性不論在總指標或個別項目上都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顯示相較於十年前，（苗天蕙，1990：114）女大學生已漸漸提高了政治涉入的程度，使得兩性即便在高階的參與活動上，也仍有相同的表現。

二、複迴歸模型的發現

在第四章中，本文以五個模型分別探討大學生的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感、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和政治參與，研究結果顯示：

1、大學生政治知識的複迴歸模型

在此模型中，性別仍爲預測大學生政治知識的重要因素之一，男大學生的政治知識較女大學生豐富，顯示控制成年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後，並不足以消弭兩性之間的差距。而模型中最重要的預測變項爲政治媒介的曝露量，且由係數值觀察得知，傳播媒介對男大學生政治知識的影響力大於女大學生。其次是個人現代性，由於人格中具有樂於吸收資訊的特質，因而促使了學生們有較豐富的政治涉獵。再其次則爲政治學相關課程的修習，且對女大學生的影響大於對男大學生的影響。而國立大學的學生可能較注重於課業，對於資訊的吸取也有較旺盛的企圖心，因此國立大學學生的政治知識較爲充份。 以上四個因素在全體大學生或男、女大學生的分析中皆爲重要的預測變項。

另外，高年級的男大學生，則因爲修讀政治學相關課程的學分數必定較多，再者，投票權的取得也可能使得他們較關心於政治，因而比低年級者有較高的政治知識得分；而外在學校功效意識對於全體大學生和男大學生的政治知識有負面的影響力，推論原因可能在於外在學校功效意識愈高，將鼓舞學生積極參與學校事務，因而減少了關心政治的機會；最後人格特質方面，權威性人格僅對於女大學生的政治知識有重要的負面影響。

2、大學生政治信任感的複迴歸模型

在初步分析時，男、女大學的政治信任感並沒有呈現差異的存在，但在控制成年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後，女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顯著低於男大學生。模型中最重要的預測變項爲個人現代性，此種人格特質愈鮮明的大學生，其政治信任感就愈低落，因爲個人現代性擁有個人主義的特質，因而容易對政府官員的言行感到懷疑，因而政治信任感較低。權威性人格的重要性則僅次於個人現代性，對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有負面的影響，此點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反，本研究推論政治信任感可能只是反映了對當時執政者的滿意度。再僅次於這兩項人格特質的是外在學校功效意識，當學生們感受到學校的管理階層會關心和在乎他們的意見時，類化到政治系統上，他們對於政府官員也會有較多的信任。以上三個因素不論是在全體大學生或男、女大學生的模型中皆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而課餘活動的參與對大學生全體或男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都有正面影響，當學生愈樂於參與社團活動以及有關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的討論會，甚至向學校提出校務建議時，他們的政治信任感也會相對地提昇，此因素和外在學校功效意識証明了學校在大學生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最後，除了上述的因素外，年級愈高和家庭政治化程度愈高的大學生，其政治信任感也愈高，但對男大學生或女大學生而言，都不是顯著的因素。

3、大學生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複迴歸模型

在初步分析中，男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較女大學生高，而模型中控制大學生的成年期政治社會化經驗後，性別仍是顯著的預測變項，男大學生仍對自生瞭解政治事務的能力較有自信。而全體大學生和男、女大學生的模型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爲權威性人格和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其中愈傾向權威性人格的大學生會基於「權威性服從」的心理，而自認爲較無法瞭解複雜的政治事務；而內在學

校功效意識亦能提高學生們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因爲學生們會將他們與學校的互動經驗轉化成對政治系統的態度，因此愈是自認爲能理解學校管理過程的學生，也愈自認爲能理解政治運作的過程。

除了上述的兩個重要因素外，個人現代性愈鮮明的大學生，其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也愈高，本研究推論此點與前面所提到的個人現代性的傾向能提高大學生的政治知識不無關係，有充份的政治知識後，自然對於自身瞭解政治事務和政治過程的能力較有自信。此外，就讀國立大學在大學生全體和男大學的模型中都是影響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因素之一，本研究推論由於他們有較豐富的政治知識，且優秀的學術環境培養了他們的自信心，因而自認爲能理解複雜的政治。而家庭政治化程度對女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有提昇的作用，父母親對政治的興趣愈濃厚、愈常參與政治性的活動以及愈常在家與子女們討論政治，有助於女大學生提昇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最後，在傳播媒介方面，三項政治媒介因素皆對大學生全體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有提昇的作用，其中政治媒介的曝露量能增進全體大學生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但對男大學生或女大學生而言，則非重要因素；另外，政治媒介的注意程度僅對女大學生有顯著的影響，男大學生則是因積極參與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而提昇內在政治功效意識。整體而言，傳播媒介在本研究中發揮了傳遞政治消息的作用，不僅豐富了大學生的政治知識，也提高了他們的內在政治功效意識。

4、大學生外在政治功效意識的複迴歸模型

在模型控制大學生的成年期政治社會化經驗後，女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仍高於男大學生，她們較相信政府官員會重視和關心人民的需求，但這並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假設，找出兩性差異的原因。而模型中最重要的影響變數爲權威性人格，愈傾向權威性人格的大學生，其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愈低，這仍可歸因於他們對於權威服從的態度，因此不認爲自己這樣的老百姓能影響政府政策或得到

官員們的關注。僅次於權威性人格的因素爲外在學校功效意識，當學生們感受到學校對他們的關心時，他們對於自身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也較有信心，這就如同內在學校功效意識對於內在政治功效意識的影響一般，再度証實了學校於大學生政治社會化歷程中的重要性。再其次爲個人現代性，它在全體大學生和男大學生的分析中都是個具有負面影響的因素，愈傾向現代性人格的學生，愈不認爲自己能夠影響政策的制定。

另外，其它具影響力的因素尚有政治媒介的參與、家庭政治化和內在學校功效意識，其中政治媒介的參與在全體大學生和女大學生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分析中具有正面的影響，因爲學生們認爲透過參加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能影響政府制定政策的過程，也相信政府因此能更關心人民的意見。而家庭政治性化不論是在全體大學生或男、女大學生的分析中都是個影響的因素，當父母親對政治的興趣愈濃、愈常參與政治活動和愈常與子女們討論政治時，將能帶動子女們的外在政治功效意識。最後一項顯著的因素爲內在學校功效意識，愈覺得自己能理解學校事務的學生，也愈認爲自己在政治系統中佔有重要性，但僅在全體大學生的分析中佔有些微的影響。

5、大學生政治參與的複迴歸模型

在初步的分析中，男、女大學生並沒有政治參與上的差異，但在模型控制政治社會化的相關因素後，性別竟爲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女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程度比男大學生積極和活躍。而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最重要的因素爲政治媒介的參與，愈常投書報紙、參加電話投票或在網路上發表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的大學生，其政治參與也愈積極，試圖透過自身的參與來影響政府人事的甄選，而就廣義的政治參與而言，參與政治媒介所舉辦的活動亦屬於其中的一環，因此有此發現並不意外。而僅次於政治媒介參與的是家庭政治化程度，父母親對政治的熱衷能帶動子女們的政治參與。以上兩個因素不論在全體大學生或男、女大學

生的分析中，都是最重要的影響變項。

除此之外，本研究顯示愈傾向權威性人格的男大學生，其政治參與愈積極。政治媒介的曝露量亦能提高學生們參與政治的程度，愈常收聽或收看政治新聞的大學生，其政治參與也愈積極，此因素在男大學生的政治參與分析中亦是重要變項之一。而外在學校功效意識則對大學生的政治參與有負面的影響，推論原因可能在於，當學生們認爲學校會在乎他們的感受時，對於政府官員也會愈信任，因而採放任的態度，在政治參與上顯得較爲被動，此因素亦是影響女大學生政治參與的重要變項。最後一個影響大學生或男、女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因素爲政治學相關課程的修習，透過課堂上的學習，使學生們對於政治事務更爲熟悉，甚至產生了興趣，因而激發他們去參與政治活動。

第二節　綜合討論

本文除了主要的研究發現外，亦有些部份值得我們再作討論。

首先我們發現，本研究中有若干結果與李美枝（1995：126）針對國內大學生所作的性別刻板印象實驗相互呼應，例如在課餘活動的參與方面，男大學生顯著地比女大學生活躍，而李美枝的實驗結果顯示：適合形容男性人格特質的形容詞多偏向工具性，例如有主見的、行動像領袖的、有領導才能的等，這些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透過各種的社會化機制潛移默化地影響個體，塑造個體往符合社會規範的性別模板發展，因此使得男大學生較積極地參與學校公共事務，且主動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再者，本文亦發現適合形容男性人格特質的形容詞，與權威性人格特質有部份相重疊之處，而女性較爲陰柔的人格特質則較不利於此種人格特質的發展，因此男大學生的權威性人格顯著高於女大學生。而女性因爲從小被教養爲保守的、謙虛的和依賴的，因此，即便她們擁有較高的個人現代性，仍不因

人格特質中樂於吸取資訊和鼓勵獨立思考等特質，而有較高的政治知識和內在政治功效意識，對自身理解政治的能力較有自信，其現代性人格尚不足以和長久以來鼓勵她們服從的社會化歷程相對抗。

其次，在政治社會化機制的部份，本研究發現家庭對大學生的政治參與佔有很大的影響力，其重要性僅次於大眾傳播媒介，有別於陳義彥等（1991，123-4）和段盛華（1988：164）過去的發現，但在政治定向的部份，家庭則往往不是顯著的因素。再者，家庭政治化對女大學生的影響甚大，不僅能提高她們的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更是大於男大學生，顯示女大學生在政治社會化的歷程中，與父母親的關係相當密切。

另外，在本文中內、外在學校功效意識對於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而言，都是最重要的預測變項，且外在學校功效意識亦能相當程度地提昇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自認爲能理解學校事務和認爲自身在學校政策制定過程中佔有影響力的學生，對於政治系統亦有相同的感受，且對政府官員有更信任，這顯示出學生們會將他們與權威機制的互動經驗相互地類化。然而學校在政治參與的影響方面，不但沒有重要的影響力，外在學校功效意識甚至對女大學生有相當負面的作用，因此就女性而言，愈認爲學校會在乎學生們感受的女大學生，可能對政府官員也愈信任，因而採放任的態度，在政治參與上就較爲被動，而由於學校功效意識與政治功效意識呈顯著的正向關係，因此日後在政治功效意識與政治參與的研究上，有必要就性別加以討論。

接著，在權威性人格方面，本文有不同以往的研究發現。本研究結果顯示，權威性人格愈高的女大學生，其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感和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都愈低落，因此愈傾向此種人格特質的女大學生，其對政治顯得愈疏離和消極。然而，對男大學生而言，權威性人格雖然降低了他們的內、外在政治功效意識，其政治信任感卻也愈低，而政治參與愈積極，這結果顯然與陳義彥等人（1991：100）或 Janowitz 和 Marvick（1953：199）的研究結果相反，再加上表 4-6 的觀

察，因此我們認爲這是反映出男大學生對當時民進黨政府的不滿，2000 年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對具有權威性人格的個體而言，民進黨執政是破壞了傳統、改變了現狀，因而使得男大學生積極於參與選舉活動，企圖改變現狀。

最後，在初步的分析中，男、女大學生並沒有政治參與上的差異，但在模型控制政治社會化的相關因素後，性別竟爲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女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程度比男大學生積極和活躍。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女大學生在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經驗並不是造成她們日後政治參與低落的原因，甚至這些成年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促使她們有較活躍的政治參與。

第三節　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最終的目的是探討兩性在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上的差異，而研究結果或証實了原先的假設，或驗證了前人的發現，或推翻了原先的假設，或修正了過去的發現，對於知識的累積期許有些許的裨益，但仍然有不足之處，若能提出檢討與建議，對於日後的研究亦不失爲一項貢獻。

首先，不論是此份或是其它政治社會化的問卷，皆未針對性別差異的部份作完整的研究設計。而就性別的主題而言，女性主義（feminism）與政治社會化理論有相同的論點，認爲性別角色並非是個人天生的傾向，而是藉由情境上和結構上的限制深植於社會，再經由複雜的社會化過程深植於個人，且女性主義認爲由於女性具有分娩和哺乳的天職，因此養育、服侍及附屬於其他人的需要等，往往被附加在女性的生產角色上，並被相對地貶低，置於私領域之中，而排除於公領域之外，形成男性優於女性的父權結構。因此日後相關的研究，爲追本溯源找出兩性在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上有所差異的原因，可透過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設計問卷，例如詢問受訪者關於婦女就業、婦女參政、墮胎、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等議題

的看法，或者有關家務分工和學校工作分派等實際情形，從中來分析社會化的歷程是否造成了個體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爲，驗証男女分工的情境限制，與父權至上的結構是否造成了兩性對政治領域有不同的互動關係。

其次，我們由研究中發現，影響兩性政治定向和行爲模式的原因並不盡相同，但過去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往往僅將性別當作基本的人口學變項以作控制，並未多作討論，甚至將兩性視爲整體來論述，或者將男性的政治表現視爲標準，而女性的差異視爲非常態。藉由本文的發現，建議日後相關的研究應針對性別作深入且個別的探討，將兩性分別視爲完整的個體，以作更明確且更有意義的分析。

最後，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女大學生有較男大學生活躍的政治參與，顯然大學時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並不是造成她們日後政治參與低落的原因。然而此點發現並非是推翻了過去的研究結果，而是提醒我們注意生命週期（life cycle）的可能性。由於長久以來社會對於父、母親責任分派的差異，女性往往負擔較大的兒女養育工作，因此家庭的束縛和公共技巧的缺乏往往限制其參與政治性的活動，McGlen（1980）的研究即顯示出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在步入家庭後，母性角色和政治行爲的相衝突，且女性走入職場並非是縮小兩性的差異，反而職業婦女身兼二職的重擔，將使得兩性於政治參與的表現上愈拉愈遠。因此，僅管本研究結果有可能是女性運動努力多年的成果，但亦不可排除生命週期的影響，應持續地觀察，仔細比較兩性於就學階段、就業階段和家庭階段等時期的異同。

現今社會中，性別平等的議題已愈來愈受到社會大眾和政府官員的重視了，但長久以來所堆砌的城牆，並非一夕之間可以推倒的，因此最後，本研究期許透過此篇文章的發現，能促使更多量化的研究者共襄盛舉，注重兩性的差異，深入地探討「性別」於研究中所帶來的意義，透過學術的力量，推動兩性平等的終極目標。